**DOI:** 10.13669/j.cnki.33-1276/z.2021.064

# 孙延钊的地方文献整理活动与贡献

徐 欢
（温州大学，浙江 温州 325035）

［摘 要］民国时期，孙延钊参与了温州地方文献的整理工作，通过搜集、校勘与著述，将一大批文献重新进行了梳理，对保护乡邦文化遗产、弘扬区域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孙延钊从事地方文献整理工作中表现出的对本土文化的“责任意识”，值得今天的温州学人更充分地认识与学习。

［关键词］孙延钊；地方文献；文献整理；温州
［中图分类号］K29; G25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326(2021)04-0039-06

# Sun Yanzhao's Activities and Contributions to Local Literature Collation

XU Huan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Zhejiang, 325035)*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un Yanzhao participated in the collation of local literature in Wenzhou, and collated a large number of literature through collection, collation and writing, which had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tection of rural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promotion of regional culture. Meanwhile, Sun Yanzhao's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for local culture in the collation of local literature deserves more recognition and study by Wenzhou scholars today.

**Key words:** Sun Yanzhao; local literature; literature collation; Wenzhou

“文献”可以认为是古今一切社会史料的总称。“地方文献”顾名思义就是地方上的文献，是文献组群中的一种。“地方文献”不同于“乡邦文献”与“乡贤著作”，它的范畴更广泛。“乡邦文献”是“写乡邦”，是以乡邦为表现中心，“乡贤著作”是“乡贤所写”，在内容上更加复杂。而“地方文献”可以被称为“乡邦文献”与“乡贤著作”的集合体，不管是“写地方”还是“地方人所写”的文献都属于地方文献的范畴。孙延钊是浙江瑞安人，他所参与整理的“地方文献”主要为浙江省内文献，其中又以温州地区居多。再谈到文献的整理，它涉及的是对文献的搜集、抄写、校勘、编述等多个方面。本文所介绍的孙延钊的文献整理活动包括了文献的搜集、校勘与编述。

## 一、孙延钊对地方文献的搜集

### 1.孙延钊与永嘉区征辑乡先哲遗著委员会

发生于1935年的征辑温州乡先哲遗著活动，是清末至民国时期温州搜集整理地方文献文化运动的尾声。虽是尾声，但永嘉区征辑乡先哲遗著委员会抄缮地方文献达402种，1 259卷，可谓是嘉惠学林，功绩显著。

关于永嘉区征辑乡先哲遗著委员会筹备期间所发生之事，平阳刘绍宽所著的《厚庄日记》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一月）十三日，初九己丑，雨。许专员邀温州文艺家连各机关共二十馀人，在江心寺浩然楼

［收稿日期］2020-11-22
［基金项目］温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9wsk050）
［作者简介］徐欢（1991— ），男，江苏赣榆人，助教，主要从事区域文化史、温州地方史研究。

开学艺研究会，推孙孟晋、叶蕴辉、陈仲陶、刘贞晦、吕灵士为会章起草员，通过文艺工作流动展览会，征集乡先哲遗著筹备会。”[1]1467“（二月）十三日……午后三时（刘绍宽）偕孙孟晋、刘贞晦在第三特区许专员处，议定征辑乡先哲遗著办法，并筹款法。”[1]1479“（二月）廿二日……孟晋草定征集先哲遗著案，余为酌定之。”[1]1482“（三月）二日……孙孟晋寄来征集乡先哲遗著草案三件。”[1]1485

日记中记载的这四件事都与征辑乡先哲遗著有关，孙延钊均有参与，并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由他担任征辑乡先哲遗著筹备会会章起草员之一，与刘景晨（字贞晦）等人负责起草征辑乡先哲遗著草案；其次，征辑乡先哲遗著办法与筹款法也由他与刘绍宽、专员许蟠云等人议定。

经过孙延钊等温属六县文化界人士近四个月的准备，1935年4月5日，第三特区征辑乡先哲遗著委员会在专员公署正式成立，众推专员许蟠云为主席，委员孙孟晋为保管兼征集股长，委员梅冷生为总务兼印行股股长。随后，各县政府也先后成立分会，征辑乡先哲遗著的工作便在全区范围内展开了。征辑委员会章程规定，征集品件包括历代温籍人士所著已刊的印本，未刊的写本和手稿、墨迹以及书版等。征集办法则根据具体情况定为借抄借印、收受捐赠、收受寄存、出资收买四类。

在整个征集过程中，孙延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董朴垞先生的《瑞安孙诒让学记》记载：“孟晋征君之哲嗣，既布其家玉海楼所藏乡先哲遗书凡四百六十二部，以备访问，又尽举原书移庋会中，以供写录。会中有此巨籍，为之基础，渐进而旁搜远访，益易为力。”[2]此外，孙延钊在玉海楼整理藏书期间，“见有关桑梓文集，别为检点……辙依类增编目录，略加校注”[3]，于1935年3月编成《瑞安孙氏玉海楼藏温州乡先哲遗书目录》，共录藏书462部。征集活动开始后，正是凭借着孙延钊编写的《玉海楼乡贤藏书目》与400多种全数移贮专署以供写录的原书，征集工作在开始时便有了坚实的基础。

征书工作历时两年又三个月，共抄得乡贤遗著332种841卷，在当时可谓集地方文献之大成（指抄本书而言），许多书在《温州经籍志》中被认为散佚的又复出现，原为玉海楼缺藏的又得增添。1937年6月底，征辑乡先哲遗著委员会将抄得的书籍全数移交籀园图书馆接管，而当时籀园图书馆的馆长就是孙延钊。

2.孙延钊与浙江省文献展览会

正当温州学界如火如荼地为征辑乡先哲文献而努力时，1936年6月，浙江省教育厅发函，由教育厅委托，浙江省立图书馆承办的浙江省文献展览会将于当年10月10日举办，省内九个行政督察区专员在各区设征品分会，负责展览会展品的征集。

温州展品分会于1936年的9月30日成立，主任由许蟠云担任，副主任为孙延钊，另有委员19人。征品分会外，为保证征品的品质与档次，教育厅还聘请了本省学者耆宿、省外热心人士192人为设计委员，组成设计委员会，孙延钊受聘为委员。

孙延钊以温州展品分会副主任与展览会设计委员的身份全程参与了本次展览活动，主要负责温州地区展品的征集。根据《厚庄日记》的记载，1936年7月25日，孙延钊首次在征辑乡光哲遗著会上报告了关于省教育厅举办文献展览的事，并提议由各县推举参与征集展品的人员。两个月后，孙延钊与刘绍宽在籀园图书馆进行了一次会话，谈到了有关文献展览筹备的具体情况：“午后至图书馆，晤孙孟晋，言文献展览之筹备，瑞安由陈穆庵、张宋颀、林志甄三君经手，甚有条理，搜得宋元明乡间碑版颇多，名人照片有数十纸，资本皆出林君，亦难得云。”[1]1681孙延钊提到瑞安的展品征集由陈、张、林三人经手，办得很有条理，搜集到不少有价值的乡间碑碣、照片等文献资料。会谈虽然仅提到瑞安一地的征集情况，但也可大致推测，温州地区的展品征集活动已经在孙延钊的安排下步入正轨。

温州征品分会虽然直到1936年9月30日才正式成立，在所有的12个展品分会中几乎是最迟的，但因为有孙延钊及时组织并进行了周密准备，最终给展览会带来了714种1 020件展品，在种类和数量上仅次于台州征品分会。根据《文澜学报》第二卷3～4期浙江文献展览会专号记载，温州展品分会的展品多是来自瑞安玉海楼或永嘉区征辑乡先哲遗著委员会。而不管是玉海楼还是遗著会，都与孙延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0月19日，温州展品分会提供的展品全部顺利抵达杭州。11月1日，浙江省文献展览会正式开放。展出了向省内外征集的图书文献文物6 000余种，2万余件。展出共进行了18天，观众达到76 000余人次。直到12月25日，孙延钊才从杭州处理完展览会的后续工作，返回温州。

3.从玉海楼到图书馆

1927—1933年间，孙延钊居住在瑞安，在玉海

楼闭门潜心整理父辈留下的图书文献。1930年2月14日的《张棡日记》记载："孟晋近颇留意典籍，于其先翁籀庼先生遗著锐意搜罗，且将《名原》所刊遗漏之古籀文一律校补。其先祖太仆公之《瓯海轶闻》又增修补正，闻助其搜罗者即莘农次子师觉。"[4]439

《浙江图书馆馆刊》1934年第3卷亦对此事进行专门报道，文章篇名为《瑞安孙孟晋氏努力著作》。《国风半月刊》1934年第5卷《瓯海访书小记》对此事也有记载：

"征君辞世后此积储美富之书藏，悉赖长嗣君孟晋（延钊）先生之维持，得以完整无恙。比岁，孟晋避嚣，迁寓郡城，杜门撰述，辄多携真籍自随；即便参稽，且以防漫藏乡里之脱有不虞也。"[5]

经过数年的努力，孙延钊于1931年编成《玉海楼丛书细目》5册，著录丛书131种6 800余册；1935年编有《瑞安孙氏玉海楼藏温州乡贤遗书目》，著录图书462部，其中明代刻本34种，抄本210种，稿本10多种。此外，《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也是在此期间编成。

籀园图书馆的前身是"籀园藏书楼"，1919年成立旧温属公立图书馆，后更名为籀园图书馆。1935年5月，经首届旧温属联立籀园图书馆理事会推选，孙延钊出任第六任馆长，籀园图书馆进入发展的鼎盛时期。

孙延钊上任时，籀图已历经22年的发展，其间陆续接纳、购入了大量藏书，需要对这些藏书进行一定的整理。此外，随着藏书不断增多，原本的目录无法满足现时的需求，增补并修改现有的藏书目录就迫在眉睫了。而通过整理与增补、修改目录能及时了解现有的馆藏情况，发现造成文献损失的原因，能有效地改进文献流通和保管工作。此后，孙延钊任温州籀园图书馆馆长期间，多方征书、募款、搜集地方文献，使藏书增至49 559册。

1941年2月，孙延钊调任浙江图书馆馆长，他的继任者梅冷生后来在《我与籀园图书馆》一文中这么评价他："那时他（孙延钊）正接手本馆，努力改善，一方面充实新书，一方面推广阅读；近几年来，本馆的借阅人数大量激增，渐渐脱离静止状态，向前进展，多是他的功劳呢！"[6]

孙延钊上任浙江图书馆馆长时随身将玉海楼珍藏悉数运出。当时正值民族危亡的时候，杭州沦陷，孙延钊精心组织图书馆先由永康迁丽水、龙泉，再移到南田，还将密贮于龙泉的善本图书安全搬藏至庆元，玉海楼珍藏也随之迁徙。1941年12月20日，孙延钊在丽水主持创办了《浙江图通讯》。对于藏书的看法，孙延钊在《浙江图通讯》的代发刊辞中这样说道："更思公私藏书，同属国家元气民族精神之所磅礴而郁积，丁兹存亡危机之秋，并顾兼护，责在我侪……"[7]孙延钊认为国家藏书与私人藏书，都由国家元气、民族精神积聚而成，而战乱年代对藏书的保护于他来说是责无旁贷的。

## 二、孙延钊有关地方文献的校勘与著述

### 1.孙延钊在瑞安期间的校勘与著述

关于籀庼遗文的整理活动在孙诒让去世不久便已进行，在整个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的是孙延钊。最早对孙诒让遗文的辑录发生在1916年，这一年，孙诒棫对从兄孙诒让的单篇学术论著《籀庼述林》进行了增补，增加了书信与散文两卷。此外，孙延钊的弟弟孙延炯，从小便"志读父书，征集校理，用心颇勤"[8]289，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便用课余时间抄录所搜集到的籀庼遗文，大概有20～30篇。后来到了1927年，孙延钊回到了瑞安，在校理孙诒让著作的同时，发现了不少的诗词、书信稿件。此外，孙延钊还不遗余力地四处对籀庼遗文进行寻访，《张棡日记》民国十九年（1930年）2月14日载："下午，赴孙资政第访莘农不适，旋访孙君孟晋，邀予入内书室谈。孟晋近颇留意典籍，于其先翁籀庼先生遗著锐意搜罗"[4]439，又见于当年2月16日记载："下午二句钟，门人孙孟晋同其侄师觉来访。予因出籀庼先生手书扇叶与看，内有先生撰赠相士诗二绝，外间均未得传，孟晋即手录之去。"[4]439-440以及2月22日的记载："晨，录孙籀公《河乡忠义祠记》，寄其公子孟晋，并附以书云。"[4]440

最后经过种种的努力，在从弟孙宣、从侄师觉的帮助下，再加上延炯之前所辑录的，孙延钊于1930年完成了8卷本的《经微室遗集》初稿的编写工作，并于1932年写成定稿。

除《经微室遗集》外，据《孙征君籀庼公年谱》与《勖庵待焚书稿目录》的记载可知，孙延钊在瑞安期间还相继写成了《孙逊学公年谱》《孙征君籀庼公年谱》《温州经籍志校勘记》《瓯海轶闻校勘记》等书，并对孙诒让的《名原》《契文举例》《籀庼述林》《尚书骈枝》《古籀余论》《周礼正义》等大批著作进行了校读。

孙延钊精于年谱的编写。他于1927—1930年间所编写成的《孙逊学公年谱》与《孙征君籀庼公年

谱》一共有4册18卷。他为厘清其祖父、父亲的生平事迹及学术成就，长达数载埋头于玉海楼的书案上，清理和阅读孙衣言、孙诒让的著作、书信、眉批和札记，并一一加以摘录。

年谱编写的同时，孙延钊还着手进行孙衣言、孙诒让遗著的校理工作。《温州经籍志》曾于1915年由浙江图书馆刊印行世，但脱漏字很多，读者“颇病其疏牾”[9]390。1927年，孙延钊回到瑞安，检取了家藏原稿，对读一遍，“谋别镌之于家，而里中梓人寥落，难于集事，乃有意先事整理”[9]390。他以浙图刊本为校理对象，在孙师觉的帮助下“几席相亲，昕夕共讨，庋册楹编，检索略遍，每于此刊本发现讹文错简，辄随笔斟正，而商榷以决其疑，各缀眉端”[9]390。1928年，孙延钊将校勘更正的内容抄录下来，就成了4卷本的《温州经籍志校勘记》。

《瓯海轶闻》一书，有58卷，是孙延钊祖父孙衣言的遗著。此书1926年刻印完毕，但由于刻印匆遽，书中讹夺衍缺严重，有几卷甚至墨钉遍布。因此，孙延钊便对书中条注、引用各书一一复勘，又补入一些后出书中的资料，并于1930年写成《瓯海轶闻校勘记》4卷。

《名原》与《契文举例》校对于1928年11—12月间。孙延钊检校的是家刻本《名原》的初刻本，与1906年孙诒让手定稿本对读，将书中的误字、脱字及版片墨钉，都补正完全。校检的《契文举例》一书则是上虞罗振玉《吉石盦丛书》本，孙延钊将它与孙诒让1908年的定稿互勘了一遍，并记其异同。

《温州经籍志》与家刻本《名原》校理完毕后，孙延钊于1929年开始着手校对《籀庼述林》。《籀庼述林》有民国丙辰五年（1916年）刊本，孙延钊便以此刊本为底本进行校对。在校对过程中，对篇文进行了删落、增补以及篇次的调整，间或有错讹文字的校改和墨钉摹补。审定著录后，一共有127篇。

1931年，孙延钊校读燕京大学新镌本《尚书骈枝》，补正讹文百余字，并补脱文一处。此外，又校读了燕京大学新镌本《古籀余论》，得附笺十余条。

孙延钊在瑞安期间校检的最后一部著作是《周礼正义》，这一年是1932年。他将楚学社本（1931年湖北笛湖精舍的木刻本，简称楚本或鄂本）与家藏定稿及孙诒让手校的铅印本（1905年出版）三者互勘。因为此书征引繁博，孙延钊“讨覈根氐，历时数载，又以凡例中有经泠字例理董书一及案语用六书正字一条。故今校于字体点画之间，亦必逐细钩稽，不敢忽略”[8]291。就这样，从1932年秋初开始校对，一直到第二年冬天，才将全书校对完毕。

2.孙延钊在图书馆、通志馆期间的著述

1935至1949年间的14年是孙延钊创作的高峰期。在这期间，他先后担任籀园图书馆馆长、浙江图书馆馆长与浙江通志馆总纂，得以接触大量的文献资料，加之在瑞安期间6年著述经验的积累，使他对地方文献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抗日战争期间，为揭露日寇暴行，以史为鉴，孙延钊还编写了一些反映不同时期抵抗外族入侵的著作。

孙延钊于1935年至1941年担任籀园图书馆馆长。其间他相继编写成了《瑞安五黄先生系年合谱》《孙敬轩先生年谱》《二十年来之籀园图书馆》《浙江畴人别记》《温州藏书家考》《浙江紫阳书院掌故征存录》《温州文献述概》《永嘉丛书览要表》《瑞安古迹录》《温州人物生卒表》《明季温州抗清事纂》《明代温州倭寇编年》等作品。下文兹举三部代表作进行介绍。

《浙江紫阳书院掌故征存录》是孙延钊1937年所写，内容分原始、建制沿革、人物考略、胜状、丛话、艺文辑目六条。后于1945年在《浙江通志馆刊》上分三次发表全文。孙延钊撰写此文是因为他的祖父孙衣言曾经在同治年间任过紫阳书院山长，家中藏有《紫阳书院增建景徽堂记》及《课艺·序》。此外他又于1936年在浙江文献展览会展览室中抄录了王同伯的《杭州三书院记略》及丁松生《武林坊巷志》稿本，效仿瑞安张鉴所写的《诂经精舍志》体例，“稍加诠整，而益以平日泛览所得，草为此篇”[10]。

《明季温州抗清事纂》是孙延钊于1936年所编写，内容分小引、史事拾录、忠烈汇传、遗老汇传、逸民汇传、诗文辑览。参考书目有计六奇的《明季南略》、邹漪的《明季遗闻》、钱澄之的《所知录》等多达89种。后于1945年在《浙江通志馆刊》上发表了一部分，分三次发表，题目分别为《明清间温州兵事拾闻（上）》《明清间温州兵事拾闻（下）》《明季温州遗老汇传》。目前，此书稿件藏于温州市图书馆古籍部，全文可见于陈光熙所编《明清之际抗清史料集》一书，这部书亦是根据《明季温州抗清事纂》的基本内容而展开的。

《明代温州倭寇编年》是孙延钊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写。当时全国各地的学界积极搜寻、编写中华民族英勇抗击外地侵略的文献，孙延钊有感于抗战以来全国各地所遭遇的比嘉靖年间更惨烈的战争灾祸，希望能够发扬先人英勇抗击倭寇时体现的团结一致、

前仆后继、百折不挠的精神，便着眼于温州地区，采录《筹海图编》《温处海防图略》《明史纪事本末》《明通鉴》等多种史料，记录明洪武二年至清顺治十四年温州地区抗击倭寇的史实。此书共4卷，现藏于温州市图书馆古籍部，后经徐和雍、周立人的编撰，录入《孙延钊集》。

通过研究1935—1944年孙延钊的作品，可以发现其中大多还是跟温州本地文献有关，扩展到浙江范围的著作也仅有《浙江畴人别记》《浙江紫阳书院掌故征存录》两部。另一方面，在浙图任职期间，他的作品较少，这与当时战乱的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作为馆长需要更多参与的是对图书文献的管理与保护。后来，孙延钊辞去了浙江图书馆馆长的职务到浙江通志馆担任总纂，也是因为他认为接触文史与写作比当馆长更有意义。

1943年，孙延钊在被聘任为浙江通志馆总纂之初，便表露了撰修《浙江通志》的想法："当先编人名、书名、地名、物名四辞典，另为掌故编文录。通志本书，但求从横提挈，愈简愈好。"[11] 后来到了1944年，通志馆在南田正式开馆，孙延钊就主要负责《浙江通志》中《人物传》的编撰。为编写《人物传》温州部分，孙延钊耗费了半年的时间翻检家藏书籍三百余种，又借书于籀园图书馆，数易其稿。他先对历代方志中有关温州的人物传记进行统计，然后对其分别删存，再进行增补。通过孙延钊的努力著述，"其结果，旧传改作者二百七十三篇，增补新传者九十四篇，大凡得传三百六十七篇。"[12]但他还是认为这些篇数过多，还要对这些人物的传记细察一遍，进一步删存润色。

除了《浙江通志》中的《人物传》，孙延钊还编有《温州人物生卒表》《浙江先哲生卒表》《温州人物传稿》《宋永嘉学者年表》共四部有关人物表、传的著作，现均藏于温州市图书馆古籍部。表传之外，因孙延钊对发源于温州地区的永嘉学派的源流与人物谱系非常了解，他曾先后编写了《浙江永嘉学派之源流》《永嘉学谱》两册。《浙江永嘉学派之源流》稿本，一册，现藏于温州市图书馆古籍部。孙延钊在阅读《四明丛书》第五集的过程中发现书中所辑录的有关温州籍儒士的内容并不完备，便参考祖父孙衣言所著《瓯海轶闻》，"复略仿四明万氏《儒林宗派》著录之意，列举名氏及受榜源流，写成此篇"[13]。《永嘉学谱》今存稿本一册，现藏于温州市图书馆古籍部。《学谱》只写了两部分，似未完稿。手稿承接《浙江永嘉学派之源流》一文，对永嘉学派的人物谱系进行了进一步的梳理，较为详实地介绍了永嘉学者的生卒年、时代环境、学术思想的演进与学术成绩。

## 三、孙延钊地方文献整理活动的主要贡献

孙延钊从1927年进入文献整理领域，直到20世纪60年代仍然对新中国的文献整理工作献计献策，时间跨度长达30多年，取得了诸多值得肯定的成绩。

### 1.通过文献整理，传承孙氏家学

孙氏家学最主要的特点是对乡邦学术的继承与发扬，而且孙氏家学也是本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孙延钊在发扬家学的同时促进了区域文化的发展。孙氏家学的精髓蕴含于孙衣言、孙诒让等人的遗著中，同时这些遗著也是地方文献的一部分。

孙延钊致力于通过整理家族文献以传承家学。例如，他所校对的《温州经籍志》《瓯海轶闻》《名原》《契文举例》《籀庼述林》《尚书骈枝》《古籀余论》《周礼正义》等大批著作，为后人对孙衣言、孙诒让著作的再整理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他们大都会参考孙延钊的校勘本，有的还会以孙延钊的校本为底本进行校读。这些年来出版的、参考了孙延钊校本的孙诒让著作仅目前笔者所见到的就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的《瓯海轶闻》、2005年9月出版的《温州经籍志》，中华书局2010年4月出版的《籀庼述林》，齐鲁书社1988年1月出版的《大戴礼记斠补附尚书骈枝、周书斠补、九旗古谊述》。

### 2.梳理永嘉学派源流，宣扬永嘉学术

孙延钊在地方文献整理过程中继承了祖、父两辈人的遗志，继续将永嘉学派发扬光大。他相继写成了一系列与永嘉学派相关的著作，主要有《永嘉学派之源流》《永嘉学谱》《浙学中的永嘉宗派》《宋代思潮中之永嘉学风》《永嘉丛书览要表》《宋永嘉学者年表》。在这些著作中，他沿用前人的做法，按照时间顺序对永嘉学派传承的源流进行梳理，并相应做出了一些简化处理，便于后人阅读。另一方面，他的著述在一定程度上对前人尤其是其祖、父两辈人的永嘉学术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同时也进行了一些必要的增补，丰富了永嘉学派的研究内容。

孙延钊致力于将永嘉学派发扬光大之举，始于日军入侵、民族危亡的关键时期，这是因为他认为发扬永嘉学派博览精思、公平批判、实事求是的观念亦能为国家、社会做贡献。此外，他还认为："夫今日中国之被侵略于东倭，亦犹南宋之被侵略于北虏。"[14]

同时认为南宋虽然有永嘉学派这种自强不息的学风，最终却未能挽救一个王朝的衰亡，是因为南宋朝廷“朝右党争迭起，奸回乱政误国也”[14]，今日却能以“抗战建国”领导全国军政百僚，唤起男女老少民众，最终是一定能够战胜日本侵略者，取得国家复兴的。

3.对温州本地历史文化进行重新追溯

孙延钊通过文献的整理达到了对温州本地历史文化进行重新追溯的目的。这种追溯主要体现在《明代温州倭寇编年》《明季温州抗清事纂》两部作品之中。有明一代，倭寇之乱对中国东南沿海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但最终湮灭在军民联合、积极抵抗的有力措施之下。孙延钊的《明代温州倭寇编年》一方面还原了当时倭寇寇温、生灵涂炭的历史事实，另一方面歌颂了温州地区人民联合官军与倭寇英勇斗争，取得了最终胜利的光辉事迹。《明季温州抗清事纂》则对明末清初这一段温州地区的兵事、遗民人物传、遗民文献进行了有效的整理与编排，基本还原了当时的社会状况。

法国历史学家罗杰·夏蒂埃曾说：“文字虽然是恒定的，但当呈现它的方式变化时，它就会获得新意义和新地位。”[15]文献资料是一个地区最能反映其历史文化的载体，通过围绕着同一个主题对地方文献进行重新编排，便能赋予这些文献以新的意义。孙延钊的《明代温州倭寇编年》《明季温州抗清事纂》两部著作便分别围绕“倭寇”“抗清”两个主题，通过对历史文献的合理编排、抄录，为我们重塑了温州本地的历史，展现了温州地区在那个时代激烈的民族矛盾与社会变迁。

## 四、结 语

时至今日，温州学界提到瑞安孙氏家族，谈得最多的仍然是孙诒让、孙衣言与孙锵鸣三人。即使在地方文献整理领域，祖辈和父辈的成就也是孙延钊所没有法相比的。但作为一名34岁时才半路出家的地方文献学者，孙延钊算得上是大器晚成，从北京回到家乡的他怀着满腔热忱，积极投身地方文献整理工作，在地方文献的搜集、校勘与编述方面均有一定建树。他的职业生涯之路由政坛转向地方文献整理领域的初衷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无法得到十分确切的答案。但有一点可以确信的是，孙延钊本人对于温州区域文化十分热爱，极有感情，并且深知地方文献对于温州区域文化的重要意义。因此，他自觉地承担起整理地方文献的责任，保护并宣扬本土文化。孙延钊这种地方文献整理工作中自觉的“责任意识”，至今仍然值得广大温州学人学习。

地方文献是记录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开展对于它的搜集、整理、保护、研究与利用工作，一直以来都显得十分重要。民国时期孙延钊进行的地方文献整理活动，在诸多方面都为当下开展地方文献整理提供了有效的借鉴。

## [参 考 文 献]

[1] 刘绍宽.刘绍宽日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8.
[2] 董朴垞.瑞安孙诒让学记[M].温州大学图书馆藏手稿本：2301.
[3] 孙延钊.玉海楼藏温州乡先哲遗书目录跋[J].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1935(2)：27.
[4] 张棡.张棡日记[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5] 张崟.瓯海访书小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之底本及钱塘罗以智遗书[J].国风半月刊，1934(6-7)：65.
[6] 梅冷生.梅冷生集[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25.
[7] 孙延钊.盛名难继之浙江省立图书馆事业(代发刊辞)[J].浙江图通讯，1941(1)：1.
[8] 孙延钊.孙征君籀庼公年谱[M].北京市图书馆藏手稿本.
[9] 孙延钊.孙延钊集[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10]孙延钊.浙江紫阳书院掌故征存录：一[J].浙江省通志馆刊，1945(2)：47.
[11]夏承焘.夏承焘集：第六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510-511.
[12]孙延钊.在编撰通志人物传工作中之自我检讨[J].浙江省通志馆馆刊，1945(1)：46.
[13]孙延钊.浙江永嘉学派之源流[M].温州市图书馆藏手稿本：3.
[14]孙延钊.宋代思潮中之永嘉学风[J].战时中学生，1939(3)：48.
[15]罗杰·夏蒂埃.书籍的秩序[M]. 吴泓缈，张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88.

[责任编辑：陈 凯]